

國語運動與文化權力的創生 ——胡適與黎錦熙在 1920 與 1930 年代的討論

徐兆安 *

萌芽於清末新政、成形在 1910 年代的「國語」，是現代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興文化領域之一。國語的「運動者」們，不但透過改造文字與語言，來重塑人們的生活世界；在構想國語應該如何推行的同時，更在定義現代國家的邊界。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賦予自己的是有史以來最驚人，也最新穎的權力來源。作為國語運動者的知識人，他們是如何理解、參與、運動這巨大的權力？本文以胡適與黎錦熙為中心，探討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的國語運動者，如何逐漸摸索出一套理解文化權力的方式。胡適與黎錦熙不但從國語研究會時期就是該運動的重要代表，他們的運動論述也多有互相發揮、補足之處，而卻少有研究者注意。他們構想中的「運動」，有別於現有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各種理解，既不是純粹的思想文藝的運動，也不是學生運動與群眾運動。國語這種運動，可說是知識人在新興的文化領域，以類似槓桿的手法，甚至接近突襲地操作國家權力，達到改變的成果。這種「運動」的觀念與實踐，展現出中國現代知識人鮮少受到重視的政治能動性。

關鍵詞：國語運動、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胡適、黎錦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萌芽於清末新政、成形在 1910 年代的「國語」，是現代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興文化領域之一。類似「國語」的因素，雖然散見於帝制時代，並非前所未有，但在現代中國建立的過程中，「國家語言政策」卻是個缺乏既定規則，在制度上猶如荒野的領域。¹因此可以說，國語運動者們不但透過改造文字與語言，重塑人們的生活世界；在構想國語應該如何推行的同時，也在定義現代國家的邊界。從這角度來看，他們賦予自己一種新穎而驚人的權力。²那麼，作為國語運動者的知識人們，是如何理解、參與及運動這巨大權力的？

國語運動的研究已經累積了豐碩成果，學者卻少有探討知識人如何處理國語帶來的嶄新權力。對國語相關的機構與政令，Elizabeth

¹ 村田雄二郎指出，「國語」的定義在清末從滿文轉變為漢語，觸發了後來單一國家語言的各種問題。Murata Yujiro, "The late Qing 'national language' issue and monolingual systems: Focusing on political diplomac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9:3 (2016): 108-125. 至於「口頭語言一元化」的預設，則如平田昌司所述，是透過清末新學制而成立。在此之前，官話的統一只存在於科舉官韻這虛構的框架中。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259-260。

² 借用自林宗德翻譯 Bruno Latour 關於巴斯德的討論。文中說巴斯德的實驗，造就了「有史以來最驚人，也最新穎的權力來源」。Bruno Latour 著，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臺北：群學，2004），頁 246。Latour 藉巴斯德的例子，指出表面上「不太政治」的所在，例如生產科學知識的實驗室，卻可以像槓桿般，對人們的生活世界產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之大，讓人無法不視之為一種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對於巴斯德甚為景仰，在表揚巴斯德時，不無自我投射之意。潘光哲，〈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思想史》6（臺北：2016），頁 1-45。

Kaske 與崔明海，均分別有專書詳細敘述。³但在敘述之餘，他們卻少有進一步探討當時人如何理解其中的權力問題，以及這些理解與整體政治觀念的關係。另一方面，對於國語論述的理解，在近年得到了新的進展。研究者從「聲音轉向」等新的切入點，更深入地理解國語論述中各環節——官話、國語、方言、拼音、簡體字等等——的內在關聯。⁴在這些研究中，機構與法令大多只作為背景；對於權力的理解，則集中從國語論述的內部，探討語言統一與多元的問題。其中最顯著的趨向，是勾勒出國語論述的原本意圖，指出國語與方言不必然矛盾，修正了國語運動必定以統一壓倒多元的預設。⁵可是，

³ Eliz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崔明海, 《近代國語運動研究》(蕪湖: 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

⁴ 其中最全面地把握國語論述中各個體段的，莫過於王東杰, 《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 一書。王氏整體地把握語言文字改革的路徑，發軔於 2010 前後。見王東杰, 〈聲入心通：清末切音字運動和「國語統一」思潮的糾結〉, 《近代史研究》2010: 5 (北京, 2010), 頁 82-106。約略同時, Jing Tsu 從海外中國的框架出發，但同樣重視語言文字改革的牽一髮動全身，與王東杰多有可以對照之處。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net Chen 的新著從國語如何成立，以及如何學習國語的角度，勾勒出國語在 1910 年代中國以至 1960 年代臺灣的歷史。但除了更重視聲音紀錄傳遞再製的科技，以及把時段延長到 1949 後臺灣以外，其對於國語論述的掌握，並未超越王東杰的專書；同時，在具體國語運動者的權力運作上，也沒有重大突破。Janet Y. Chen, *The Sounds of Mandarin: Learning to Speak a 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and Taiwan, 191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此外，在清末民初「官話」、「國語」、Mandarin 等概念相互糾結。對此從頭整理的，則有 Jeffrey Weng, "What Is Mandarin? The Social Project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3 (August 2018): 611-633.

⁵ 王東杰細緻地重構了胡適與黎錦熙等「不統一主義」。王東杰, 《聲入心

在統一與多元以外，國語運動同時蘊含各種根本的政治問題——如秩序與規則的建立、權力與制衡、推行國語的行動者如何產生，又如何被監督等。這些重大的問題，往往都消失在討論之中。換言之，近年趨於蓬勃的國語運動研究雖然更深入地理解何謂「國語」，但也進一步跳過如何「運動」權力的一面。對於國語運動政治意義的理解，沒有重大的推進。⁶

本文以胡適(1891-1962)與黎錦熙(1890-1978)為中心，探討 1920 至 1930 年代的國語運動者，如何逐漸摸索出一套理解國語權力的方式。從國語研究會時期，胡適與黎錦熙就是該運動的重要代表。他們的運動論述互相發揮、補足，其間的密切關係卻甚少受到注意。⁷在時

通》，頁 388-431。關於方言與國語在現代中國的同時建構，參考 Jin Liu,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iscourse of *Fangyan* in Moder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1:3 (October 2016): 217-233; Gina Anne Tam, *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⁶ 這樣的修正，卻很容易讓討論圍繞著「國語運動是否壓制方言」來進行攻防。這樣的視角固然呼應「尊重多元」的當代關懷，但卻有極多的限制。由這視角出發，一來自動接受了「方言」與「國語」對立的預設，更等於默認「言文一致」是不可逆，沒有其他可能性的既定事實，結果無法繼續從原理上思考「方言」與「國語」的思想源流，以及其正當性的所在。事實上，從 Gina Anne Tam 的 *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 就可見，方言與國語其實是同時建構的過程。方言與國語的分類與標準化，同樣是植根於晚清輸入或發展的拼音工具，以及聲音應該紀錄的新觀念。若把「方言」視為先行存在，從「保護方言」的角度衡量國語運動的得失，就很可能會有倒放電影，淆亂發展次序的問題。其實，「語文合一」預設在民初成為主流前，「文通行，語分殊」的框架下，「方言」一詞固然存在，但沒有「聲音語言為一切溝通源頭的預設」，「言」的分殊也不會引起重大爭議。因此，所謂方言的危機，並不應該被簡化為一個先行存在的弱勢勢力，遭到後來的強大的國語威脅。

⁷ 對於胡適文學革命論與國語運動的關係，已有若干討論，例如吳曉峰，《國

段上，本文以 1920 至 1930 年代為範圍。對於國語運動來說，此時期大致包括三個重要階段：1920 年改國文為國語的重大勝利，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後的順利過渡，以及 1930 年代與左翼語言論述的文化競爭。

國語運動雖然以國為名，留下的官方政策討論卻相對稀少。這既有史料本身的限制，更因為國語運動多由沒有明確官方身分的知識分子推動，施行權力的方式集中在論述與宣傳的層面。因此，本文將對胡適與黎錦熙在 1920 與 30 年代留下的相關文本出發，探討在 1934 年總集式文本《國語運動史綱》出現前，國語運動者如何逐步修正對於權力的理解，得出相對能夠自圓其說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國語運動史綱》是現有眾多相關研究的主要材料，但該書作為文本的複雜性卻少受到探討。首先，《史綱》內容不少編纂改寫自黎錦熙較早時出版的文字，若加以爬梳對勘，將能發現黎錦熙對於本身說法的調整。更要者，若只孤立地閱讀《史綱》，無形中便會過分強調黎錦熙的獨特性。⁸而本文從文本出發，發掘出黎錦熙與胡適具體互動之處，在黎錦熙與更廣泛的語言改革之間，補入一個關鍵的失落環節。

本文所根據的，都是當事人意識到有關連、甚至直接互相引述

語運動與文學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但這些討論多數集中在文學理論的內部，少有顧及國語運動所產生的具體政治聲稱與行動。對於胡適國語文學論的思想資源，以及五四思潮的清末先聲，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此處不逐一枚舉。本文參考最多的，是陳以愛，〈王國維與胡適文學革命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臺北，2018)，頁 63-115。

⁸ Janet Chen 在其近著中提出，必須超越《史綱》才能理解黎錦熙更廣泛的角色，但其取徑並不在於深入探討《史綱》形成的文本與思想淵源。Janet Y. Chen, *The Sounds of Mandarin*, 21.

的文本。包括胡適〈國語的進化〉⁹(1920)、〈國語運動的歷史〉¹⁰(1921)、〈國語運動與文學〉¹¹(1921)、《國語文學史》¹²(1921-1922)、〈《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卷頭言〉¹³(1923)、《白話文學史》¹⁴(1928)、〈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國民黨〉¹⁵(1929)；黎錦熙的〈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國語文學史》代序)〉¹⁶(1927)、〈國語運動的紀念年〉¹⁷(1932)，以至於《國語運動史綱》¹⁸(1934)等，都提供充分的文本線索，指出它們之間有著當事人也意識到的前後關聯。

綜合這些前後相關、互相參照的文本，可見胡適與黎錦熙的運動觀念圍繞著三個問題開展。本文第二節指出，在推行國語上，胡適與黎錦熙都推崇強力，甚至強迫的手段，認為否則無以及時解決中國語文的種種頑固問題。這些手段以命令與法律為中心，即使是

9 胡適，〈國語的進化〉，《新青年》7：3(上海，1920.2)：10-22。

10 胡適，〈國語運動的歷史〉，《胡適時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卷2，頁61-63。原刊於胡適講，嚴既澄、華超紀錄，〈國語運動的歷史〉，《教育雜誌》13：11(上海，1921.11)，頁8-9。

11 胡適，〈國語運動與文學〉，《胡適時論集》，卷2，頁82-84。原刊於胡適講，郭俊覺紀錄，〈國語運動與文學〉，《晨報副刊》，1922年1月9日，第3版。

12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國語文學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

13 胡適，〈卷頭言〉，《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1：7(上海，1923)，頁1-4。

14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新月書店，1928)。

15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時論集》，卷3，頁355-365。原載於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2：6/7(上海，1929.9)，頁11-25。

16 黎錦熙，〈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國語文學史》代序)〉，《胡適全集：國語文學史》，頁1-15。

17 黎錦熙，〈國語運動的紀念年〉，《國語週刊》(北平)2：31(北平，1932.4)，頁1。

18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勸誘、誘導，也要有以國家之名發布的相應條文為基礎。國家的干預只怕不夠，不怕太多。在國語這個新的文化領域中，現代國家的命令、法律是否真的必要？又需要怎樣的手段來推行？在國語論述中，這些問題都少有受到檢討，呈現「留白」的狀態。

其次，那樣巨大的，可以強迫人民順從，類近於帝制時代皇權的權力，在民國時代又如何得到正當性？「自然趨勢」的概念，在經過怎樣的思想工程後，成為國語運動的主要理論依據。國語運動者往往把他們的主張述說為必然而自然的發展。訴諸自然的論述卻帶來一個悖論：如果國語運動真的是自然的發展，那運動者們大可袖手旁觀，不用大張旗鼓地遊說政策的改變。本文第三節指出，這問題在胡適《白話文學史》中才得到稍能自圓其說的處理。胡適塑造出「認清自然趨勢」並加以適當「人力干預」的先覺運動者，把革命定義為「自然趨勢」加上「人力的一鞭」的說法，消解了自然發展與政策干預的對立。

人力調節自然趨勢的說法蘊含一種特殊的菁英主義。國語運動者所謂的「運動」，就是由察知自然趨勢的先覺運動者，運動國家的權力，藉法令來為自然趨勢加上人力一鞭。本文第四節指出，由於「大眾」在文化政治中有日益上升的正當性，黎錦熙打磨了論述中菁英主義的稜角。但局部的修飾並沒有改變國語運動論的中心預設：「先覺者調節自然趨勢，大眾跟隨這個合自然人力為一的新方向」。¹⁹

¹⁹ 本文並非要重複對於文學革命「菁英主義傾向」的批評，而是要指出：國語運動者當時真正的戰線，其實是在改變政策，不是一般想像的對大眾宣傳；就算他們以「菁英」自居，這「菁英」的定義也不是不證自明的，其中有種種理論問題必須處理。對於新文化運動中菁英主義的批評非常多，此處不一一羅列。本文主要參考羅志田，〈文學革命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反響〉，《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尤其是頁300-301。

由這三個問題出發，本文除了回應近年趨於蓬勃的國語運動研究，更試圖為現代中國史領域中三方面關鍵議題帶來新的思考。首先，從胡適與黎錦熙的國語運動論可見，國家的權力並沒有現成的樣式，讓人跟隨既定的規則來施行，反而是特定的個人，在國家權力缺乏明確定義的時刻，透過論述與行動形塑出國家權力的定義。這種特定個人可以摸索出國家權力邊界的狀態，Pierre Bourdieu 稱為國家權力的創造時刻。²⁰ 在創造時刻中，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之間的界線尤其模糊。這一點在清末民初「教育界」中尤其明顯。清末的學部與民初的教育部，都缺乏先行存在的權力，政策推動時所依靠的，是藉由教育會的網絡所組織起來的非官方教育領袖。自 1911 年的中央教育會以後，至少到 1928 年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官方與非官方教育家共同參與的教育會議成為制訂教育政策的主要場所。約略於同一時期興起，國語運動的相關機構，也長期處於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曖昧狀態。²¹ 簡而言之，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與

20 「國家權力的創造時刻」(genesis of state power)的說法，來自法蘭西學院「論國家」系列講義。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eds. Patrick Champagne, Remi Lenoir, Franck Poupeau, and Marie-Christine Rivière, trans. David Fernba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89-94. 在國家的創造時刻，特定的個人可以自己書寫他們所依循的規則。他們的權力大多是專斷的(arbitrary)，而不是常態化(routinized)的，充滿意外性，往往不受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由於權力並非直接來自社會經濟基礎，個人可以藉由定義新型的權力，獲得不成比例地廣大的影響。本文開首所述拉圖對於巴斯德與實驗室的討論中，就強調槓桿的概念，正好與此相通。亦因此，本文並沒有採取 Bourdieu 更為有名的文化資本論。文化資本論注重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轉換，仍然預設經濟基礎與文化權力的大小有一定的對價關係。

21 推動國語的政策，正是由在 1911 年的中央教育會開始凝聚。此後，高度重疊的人際網絡，陸續組成 1913 年讀音統一會，1916 年國語研究會，以及 1919 年在北京政府教育部組成國語統一籌備會。即使政權更迭，這些

教育領域，國家權力由沒有明確官方身分的行動者推行，很可能並不是零星的例外，所謂的灰色地帶，反而是更廣泛的常態。

國語運動論蘊含著自然與人力之間的辯證，也是清末民初兩道重大思潮碰撞後的迴響。一方面是進化論，或更廣義的線性自然發展觀念下，對於客觀公理的敬畏；另一方面，則是隨著變法與革命思想所興起，對於人可以精神力量扭轉發展走向，多種不同程度的唯意志論(voluntarism)。對於這兩種思潮，學界早已有眾多研究；但兩者間的張力以及互動，卻是直到近年才有更具體而深入的討論。正如劉季倫所指出，早自 1910 年代後期，毛澤東就提出自然既規定人類，但人類同時也有責任以其自由意志反過來「規定自然」。²²胡適與毛澤東的思想淵源固然不見得有太多重疊之處；此處所要指出的是，這種整合自然與意志論的嘗試，在 1910-1930 年代廣泛見於政治光譜中不同位置的思想家。²³

國語運動的組織，在人事與制度上都大致一脈相承。南京政府 1928 年的國語統一籌備會，黎錦熙等成員大多從前一階段安然過渡，連會址也維持在北京的舊址。

²² 劉季倫，《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頁 9。

²³ 這一點在王中江的專書已有扼要的概述，但書中關於胡適的專章，卻沒有對國語運動相關的論述納入討論。王中江，《自然和人：近代中國兩個觀念的譜系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另一方面，黃克武認為，早在 1906 年胡適已經展現出以「人治」來補救「天行」的思想，而這思想貫串了胡適在 1910 至 1940 年代的社會政治哲學。黃克武，〈舊學與新知——胡適對赫胥黎思想的認識及其限制〉，《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臺北：商務印書館，2021），頁 68-73。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假定胡適在 1900 年代的解答，自動地處理他後來所面對思想界的變動，以及文化政策中新的具體問題。從國語運動的例子可見，面對新的具體議題，胡適還是會在自然與人力之間擺盪，待處理其中的理論問題後，再回歸到原本重視「人治」的傾向。本文第三節將指出，〈國語的進化〉

最後，知識人如何製造權力、掌握權力，是現有思想文化史中較少學者著墨的一面。隨著清末各種的思想與制度變革，現代中國知識人失去了與常規政治的穩定連結。這種政治上的邊緣化，素來是二十世紀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出發點，在探討知識人的政治參與時，研究者都留意到他們掙扎的一面。至於知識人在各種新的文化領域——舉凡教育，出版，媒體等等——的活躍，雖然也廣受注意，但始終被預設為次要的政治力量。本文則指出，國語的「運動」，與多種關於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的定義，都無法完全吻合。它既不是純粹的思想文藝的運動，也不是學生運動與群眾運動。²⁴國語這種運動，可說是知識人在新興的文化領域，以類似槓桿的手法，近乎突襲地操作國家權力，達到改變的成果。這種「運動」的觀念與實踐，展現出中國現代知識人鮮少受到重視的政治能動性。

二、秦皇漢武之規：淋漓痛快的政策變革

身處民國時代，國語運動的領袖黎錦熙卻從不掩飾對於古代帝王統一大業的嚮往。在 1934 年出版的《國語運動史綱》中，黎錦熙極為推崇清末士大夫推動國語的強制手段。他所特別注意的，是切音字母的主張者勞乃宣(1843-1921)。勞氏在 1908 年奉召廷對，曾建議「凡不識漢字而能識此[切音]字者，一體准作公民，又勒定五年之後，官府出告示批呈詞，皆參用此字」。黎錦熙認為，勞氏的提案是一種「強迫之令」：不但以

是偏向天行一邊的論說，到《白話文學史》時，胡適才在國語的議題上，回到人治補救天行的路線上。

²⁴ 關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概念的各個層次，參考陳建守，〈作為集合事件的「五四運動」：五四的概念化與歷史書寫〉，收入黃克武主編，《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9），頁 412-444。

切音字為公民身分的資格，更將切音字定位為官方文書的合法文字。據此，黎錦熙認為他們推動國語的方式「比現今來得乾脆多了」，可以「遠承秦皇漢武之規，更開新局，何等淋漓痛快」。²⁵對於國語運動無法像在帝制時代那樣雷厲風行，黎錦熙隱然有惋惜之意。

把民國時代的國語運動比附於秦皇漢武的統一，不是偶然的引喻失義，而是一種用字上有意識選擇。清末的國語論述中，不少論者注意到語言改革將劇烈改變民眾既有的生活世界，因此不能以完全強制的手段推行，需要在勸導與強迫之間平衡。以和聲字母的主張者王照(1859-1933)為例，他就曾在1906年轉錄〈直隸大學堂學生上袁宮保稟〉一文，分論勸導鼓吹與強制兩政策。勸導鼓吹方面，王氏與學生們主張官方資助編刊白話報，但「不必強人人必閱」。他們相信只要提供白話新聞文章，配合教育讓「人人能閱」，官話就會自然地流行(「雖禁之不閱不可得矣」)。²⁶在強制方面，既然有官話這種「捷徑」，就不應該讓民眾「自便徘徊」地「觀望」，因為那只會貽誤推行立憲的時機。官話的學習，當由「國家立一強民就學之法」。王氏引述西方國家強制教育的成例，適齡學童不入學，「則罪其父母」；此外，在頒行官話字母以後，人民無論男女貧富，如非老弱缺乏學習能力，都必須認識這字母，否則便要受罰。²⁷

勸導強制並施的方案，既基於菁英啟蒙民眾的預設，但同時也有節制地使用國家權力，避免濫用立法手段的思考在內。黎錦熙推崇勞乃宣的強制手段，但勞氏在清末的語文改革者之間，其實最明顯地表現出節制國家權力的取向。他的〈原眾〉篇就提出，作為「君子」的統治者雖然處於帶領「眾」的位置，但同時不能不對「眾」的力量保持敬畏。因為敬畏，所以不能把氣質不整齊的民眾，強行以君子的價值觀來模塑。

²⁵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1，頁30。

²⁶ 王照，《官話和聲字母》(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頁8b。

²⁷ 王照，《官話和聲字母》，頁9b。

君子只能就民眾既有的狀態，取長略短，並因勢利導地誘導他們跟隨自己的價值觀。勞乃宣因此批評當時的改革者，往往有對民眾「責之深，取之隘」的傾向——要求過高，反而無法運用民眾的長處。在手段上，勞氏不主張完全以武力，法律，或是單方面灌輸的方式來改變民眾。²⁸他對教育改革的討論，就強調要把學生引誘進來，參與新式學堂，而不是以高標準來苛求這些半教化的學生，讓他們見難而退。²⁹

勞乃宣以刑律研究成家，相較於後來的國語運動者，這背景讓他能更完整地思考國語政策在整體政治秩序的位置。在清末的刑法現代化爭論中，勞乃宣認為刑律不能脫離禮教，反對沈家本〈修正刑律草案〉，被定位為所謂「禮教派」的守舊代表。因此，勞乃宣的「君子」、「民眾」、「勸誘」等概念，一方面可以說勞氏主張散漫而寬泛的禮教管治，反對刑法成為獨立領域。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勞氏的禮教論，也預設了一種由下而上的禮教產生過程：「律何自生乎？生於政體。政體何自生乎？生於禮教。禮教何自生乎？生於風俗。風俗何自生乎？生於生計。」³⁰因此，勞乃宣構想的國語政策，不可能完全依賴單方面由上而下的強制，而必須顧及，甚至敬畏民眾間的現有慣習。

進入民國以後，清末前輩們比較細膩的討論，舉凡敬畏民眾，有限度的使用強迫權力，勸誘與強行並用等，都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強力政策的嚮往。黎錦熙以「秦皇漢武」來形容統一事業，並不是一時的孤立例子。這個概念，最晚在1927年已經成形。此年黎錦熙將胡適

28 勞乃宣，〈原眾〉，《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新北：文海，1969)，卷1，頁1a-b。

29 勞乃宣，〈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簡字譜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王東杰的討論，見王東杰，《聲入心通》，頁166。

30 勞乃宣，〈新刑律修正案彙錄序〉，《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5b。

1921 年在國語講習所授課的講義，以《國語文學史》為題印行，卷首收錄一封黎氏寫給講習所三名舊生的信，作為代序。信中討論中國文字語言改革的歷史，有云：

中國實行「國字統一」的政策，在籌備「國語統一」之前二千二百年，主持者是秦始皇與李斯；中國實行「文體復古」的政策，也在提倡「文學革命」之前二千一百年，主持者是漢武帝和公孫弘。……而近幾年來這種「文學革命的」運動，也實在比五四運動，打倒帝國主義等，其關係還要重大。³¹

黎錦熙完全瞭解國語運動者與這些古代帝王的目標完全不同。事實上，漢武帝的文學復古，正是黎錦熙視為導致中國語文分離的元兇。但這卻似乎並不妨礙他對帝王強力政令的欽羨。

循著國語講習所與《國語文學史》講義的線索，我們更可以看到，這種相信以國家一紙命令直截了當地解決問題的思路，早在 1921 年已由胡適提出。對於胡適及國語運動者來說，1919 年的五四運動並不是推動國語的里程碑。該運動自清末以來的最大勝利，其實來自 1920 年教育部把小學國文科目改為國語的命令。1921 年 11 月 12 日，時任國語統一籌備會委員的胡適在國語講習所演說，他指出，國語運動長期以來都由「私人和團體組織機關」——例如 1916 年成立的國語研究會——推動，缺乏「政府的力量」。這次改國文為國語的勝利，正可見「政府一紙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幾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來做。」³²對於政府的權威，胡適調侃為「空文」，擺出不卑不亢的在野者的姿態。可是，利用這種權威，以法令條文解決文化問題，其實卻一直是他構想的方針。早在 1919 年 2 月，胡適在英文《北京導報》(Peking

31 黎錦熙，〈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國語文學史》代序)〉，頁 5。

32 胡適，〈國語運動的歷史〉，《胡適時論集》，卷 2，頁 63。

Leader)上介紹白話文運動時，就指出其語文改革的目標，不單在以白話文作為教育媒介，更在於使白話文成為唯一合法的文學語言。³³

《國語運動史綱》對於國家強力政策的推崇，是一直縈繞在國語運動者之間的想法。但對於強制手段的潛在問題，卻鮮有反思之意。錢玄同(1887-1939)是少數的例外。早在1921年，他已經意識到改革者對待被改革者，就算對方是「反動」守舊的敵人，也存在著倫理困境。當年日記有這樣一則：

我在兩三年前，專發破壞之論，近來覺得不對。殺機一啟，決無好理。我以為我們革新，不僅生活見解，第一須將舊人偏窄忌克之心化除。須知統一於三綱五倫固謬，即統一於安那其(Anarchism，無政府主義)、寶雪維茲(Bolsheviks，布爾什維克)也是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處而不相悖，方是正理。佛有小乘、大乘，孔有三世之義。其實對付舊人，只應誘之改良，不可逼他沒路走。³⁴

錢玄同指出一個弔詭的狀況：舊人的缺點是「偏窄忌克」，但如果身為新人的他們用充滿「殺機」的手段，消滅舊人的生存空間，「逼他沒路走」，是不是同樣犯了「偏窄忌克」的弊病？由此思路推進，無論是如何正確的道理，強制的「統一」都將會是「謬」。對此，他提出了一個不完整，但較合理的答案：不要用強制的手段，而要引誘舊人順從改良的道路。

但柔性的引誘並沒有完全解決語文革命的倫理問題。首先，錢玄同還是先預設了新人掌握自然的公理，舊人必須順從，而否定舊人也至

33 席雲舒，〈五四前後胡適論文學革命的三篇英文論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10(北京，2020)，頁196-210。

34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上冊，頁367。

少看到這個公理的一部份。他們的自然之理，至少在當下是絕對不「公共」的。柔性的手段並沒有解決這強勢的自然公理觀。再者，所謂的柔性勸誘，其實也必須依靠強大的公權力提供物質與制度上獎勵。這種權力，當然與直接施加暴力，或以法律制度強制不同，但同樣需要國家的權力來執行。在這問題上，錢玄同再次顯示出他的敏銳。1925年時，有人提出由政府公文開始使用白話文，誘使想擔任公務員的高學歷人士採用白話。錢玄同不贊同這勸誘的手段，因為：「傳播國語若用此等枉尺直尋的手段，其流弊甚大。結果或將至於『枉尋直尺』都辦不到——即使辦到，國語也不應該這樣賤賣。」³⁵錢玄同對於國語運動有特別多的反思，很可能是因為他在當時各種思潮間的激烈擺盪：以太炎門人身分，帶著舊學權威加入國語運動陣營；在政治思想與語文改革上，嘗試各種激進的思想實驗，包括無政府主義與廢漢字；在20與30年代，卻受聘於教育部，要著手各種具體的改革方案，包括1935年的簡體字案。但與此同時，錢玄同的思想糾結，卻沒有讓他脫離運動訴諸官方力量的方針。他與黎錦熙等國語運動者，一直以教育部國語委員會為基地，推動各種語文改革的法令。

截至1930年代，胡適與黎錦熙一直沒有直接討論「強制」與「強迫」帶來的問題。他們都集中於政策的制定，把執行的過程「留白」，似乎預設只要以國家的權力成立新規則，人們就會自動跟從，彷彿沒有任何摩擦與衝突。在〈國語運動的歷史〉(1921)出版的同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好政府主義〉，其中就展現出這種預設。〈好政府主義〉說明政府權力的重要時，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改國文為國語的成功：

³⁵ 疑玄同，〈公文與白話(3)鞋子話〉，《國語週刊》24(北京，1925.11)，頁7-8。

數年前曾主張白話，假如止是這樣在野建議，不借政府的權力，去催促大眾實行，那就必須一二十年之後，才能發生影響。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對於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沒有多大的效果。現在因為有一道部令，令小學校通同用白話文教授。這樣一來，從前反對的人，近來也入國語傳習所，變成贊成的了；從前表示贊成的，這時更高興，更來實行起來了。試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縮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數人鼓吹的工具之實施期間，政府權力之重要，為何如者！³⁶可以讓反對的人自動變成贊成，這權力算是威迫，還是利誘？胡適沒有進一步言明，他似乎也不認為這值得花費筆墨解釋。黎錦熙也沒有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其所著《史綱》，主要就是一部國語運動者運動國家力量的謀略史。關於《史綱》的敘事及其政治意涵，將在下節繼續討論。

三、水到自然渠成：運動只是輔助既有的趨勢

雖然繞過了是否「強迫」人民順從的問題，從上節可見，胡適與黎錦熙並不諱言動用國家權力的必要性，以及其立竿見影的效果。接下來的問題將是：在民國政體之下，誰可以成為掌握這龐大權力的主體？掌握文化權力的人們，其正當性又從何而來？對於運動主體的問題，國語運動的論述中沒有太多正面的回答。運動者所採取的策略，反而是把作為權力主體的、具體的人淡化，而強調運動方向是根據語言發展的自然趨勢。「自然化」成為國語運動者回應各方反對者的有力武器。在論辯上，誰可以公然與自然而必然的進化對抗？但當涉及具體的政策設計時，

³⁶ 胡適，〈好政府主義〉，《胡適時論集》，卷2，頁58。原刊於胡適講，甘蜚先記錄，〈好政府主義——胡適之在中國大學講演〉，《晨報副刊·講演》，1921年11月17日，第1版；1921年11月18日，第1版。

這種自然趨勢論便展現出潛在的破綻：假設白話與國語真是一種自然趨勢，那它為何在 20 世紀初的中國沒有自動普及於人民之間，而需要政策推動？自然發展與政策干預的潛在矛盾，遂成為國語運動理論中必需解決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化」是民國建立後的國語運動者所採取的路線，清末新政時期的前輩並不以「自然」為語文改革的正當性來源。吳稚暉(1865-1953)就不認為自然的聲音，或所謂的天籟，可以自動成為國語的標準：「聲音既天然不齊，則必以文字齊之而後可」。³⁷王東杰就敏銳地指出，吳稚暉 1900 年代文字整齊標準的概念，其實與論敵章太炎(1869-1936)殊途同歸。吳主張的是建立一套口說的國音，作為共同媒介；章太炎則認為文字配合學問養成，才是傳承的國粹。但他們都預設文字是問題的核心，透過文字才能達到「齊」(有準則)的效果。換言之，他們抱有同一套放任語言自然發展不可靠，必須以文字整理的觀念，只是整理的方向不同而已。³⁸

從語言文字理論到政治手段的想像，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者都脫離了清末的共識。他們預設語言比文字更接近自然的狀態，因此更為基本。這種揉合「語言 vs 文字」與「自然 vs 人工」兩個問題的論述，歸結於胡適 1920 年〈國語的進化〉一文。在胡適的分類中，擁護書寫文言的人是主張干預的：他們都認為文言文經過歷代文人累積研究，所以一直改進；反對任由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自由改變，認為那只會造成「粗鄙不堪入耳的俗話」。³⁹國語運動則來自民眾的自然演進，是不

37 吳稚暉，〈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吳稚暉先生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卷 5，頁 39。王東杰的討論，見王東杰，《聲入心通》，頁 178。

38 王東杰，《聲入心通》，頁 134。

39 胡適，〈國語的進化〉，頁 4。

干預、順從自然的。胡適文章的前提，因此可以歸納為：變化等同進步，所以等同「有用」。文字既然是應用的器物，而「天下的器物制度決沒有無用的進化，也決沒有用處更大的退化」。⁴⁰胡適接著指出，古代文學家有意製造的文學，最多「只可定一時的標準，決不能定百世的標準」，因為他們的「有為」，反而把文學凝結在某一時代。相反地，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白話才是活的，順從日常需求，隨時變遷。也只有這些活的創造者，才能真正地因應時代的需求，製造出新的語文工具。

41

至此，胡適翻轉了清末語文改革的思路。清末改革者以手持官方權力的菁英自居，要改造語文工具，給予人民使用；但在胡適眼中的國語運動，工具卻應由民眾之間自然產生。胡適挑戰由上而下的政策灌輸，改以由下而上的演化為宗旨，絕對是一種十分有吸引力的論述。但落實到政策與制度時，由下而上的國語要如何推行？又會由怎樣的主體推動？「小民」不見得會自動成為變革的主體，誰會代表他們發言與行動？

〈國語的進化〉並沒有解決這主體性的問題。在胡適的論述當中，立論者是一個外部存在的敘事者與研究者，彷彿與運動本身無涉。文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到這個旁觀者的視角，以及其所帶來的疑問：

⁴⁰ 胡適，〈國語的進化〉，頁 4-5。

⁴¹ 胡適，〈國語的進化〉，頁 4。誠如陳以愛前引文〈王國維與胡適文學革命論〉所指出，胡適的這種時代觀多有轉手自王國維之處。可是，從「自然」的問題切入，我們就會看到，胡適的確翻轉了語文理論中的政治想像。王國維認為代代不同的文學，就是演進；胡適的立場，則是不滿於凝結為一代之文的文人製作。他認為有一種從古到今不止息的「進化的生機」，反而會被一代之文所阻礙，「文字就漸漸乾枯」。藉此回到中國文化與文字行將就木的危機論，主張文學革命的必要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從既有文學史論提煉出「自然」與「造作」的二分，他以哥白尼革命自許，也不是全然無理的。

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卻有個條理可尋；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⁴²

「斯文中人」是歷史上主盟文學的士大夫。按胡適所論，只要他們退場，就會讓小民的發明得到發揮的機會。但這些小民發明才是自然之理的事實，卻是由敘事以外的第三人敘述者(也是研究者)所發現的。這個研究者的角色，與以前的斯文中人又有何分別？既然歷代的一代之文，也是斯文中人所創造的；他們這些身處現代的研究者，會不會最後還是凝結出一套當代之文，最終成為進化的阻礙？胡適對此有所警覺，所以他補充說「一個時代的大文學家」，至多只能把那個時代的現成語言，結晶成文學的著作；他們只能把那個時代語言的進步，做一個小小的結束。這些文學家「是語言進步的產兒，並不是語言進步的原動力。」他也察覺到，運動者其實處於與古代士大夫相似的位置：「我們還是斯文中人尚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況大多數的平民呢？」⁴³但胡適始終沒有明白說出，國語運動者們是不是這種文學家，還是這些運動者就可以代表民眾本身。如果是後者的話，運動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當代文化政治的特殊位置？因此，雖然〈國語的進化〉奠定「自然」作為國語運動的正當性來源，但由於文中並未整合「斯文中人」以及「代表大眾」這兩種角色，這篇文章仍未能為運動提供圓滿的理論根據。

以大眾之間的自然發展為改革的依據，並不是胡適的孤見。同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蔡元培(1868-1940)1919年底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作〈國文的將來〉的演說時，就已經採取這種「自然化」的論述。蔡元培

⁴² 胡適，〈國語的進化〉，頁4、6。

⁴³ 胡適，〈國語的進化〉，頁6。

指出，在歐洲，有從「拉丁文到本國文字」的發展；在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漸趨於「言文一致」，他從此推論出文字從間接轉向直接反映語言，是無法抵抗的自然趨勢，「白話和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佔優勝」。⁴⁴繼胡適〈國語的進化〉之後，黎錦熙前引的〈《國語文學史》代序〉(1927)也從自然趨勢立論。黎錦熙認為，只要打倒從漢武帝以來「文體復古」政策的人為干預，那無論古典文學、民眾文藝、方言文學都可以各得其所地自然發展。

在語文政策的論述中訴諸自然之力，卻無可避免地引來一種悖論：如果白話化是自然發展且無法抵抗的結果，那是不是根本不用運動者們來提倡，就會自動地水到渠成？對於國語沒有「自然發展」完成，需要如何推行、由誰推行、以何種標準推行等問題，胡適在 1920 年代初並沒有說明。等到 1928 年的《白話文學史》裏，他才對於運動者的角色有清晰的定義。胡適在 1928 年的答案，卻與張士一(1886-1969)在 1920 年前後「京語京音」論戰中的說法大致相仿。雖然我們無法肯定胡適承襲自張士一，但張士一尋找語文改革者定位時的思路，及其所面對的問題，都與胡適及黎錦熙多有相通之處。此處先交代張士一在 1920 年的論說，隨後再回到胡適 1928 年的《白話文學史》。⁴⁵

張氏是英語教育家，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曾參與國語統一籌備會，但他一反 1915 年讀音統一會以文字為本，以「整合並創造」的標

44 蔡元培，〈國文的將來〉，朱麟公編，《國語問題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影印上海中國書局 1921 年版)，卷 1，頁 44。

45 張士一，〈主張京語京音的・其五〉，朱麟公編，《國語問題討論集》，卷 2，頁 34。對於採取京音還是創造國音，張士一與胡適在 1920 年時的立場相左。胡適當時拒絕承認「當下已經存在一個國語的標準，可以立刻推行」，他對於共同語的態度，一直依違於「官話約略等於國語」，以及「不必立刻定立共同語」兩者之間。張氏為了彌縫他與胡適的分歧，就指胡適只是說「語體國文」，即是文字的標準不用先定；但不是說口語的標準不必先定。

準音「國音」來配對的方針，主張從既有的語言本身為標準，也就是「當時」「北京本地人有中等教育的」「京語京音」為標準。

以京語京音為國語，並非張氏首創。他的主要突破，在於以國語運動的「自然」論來支持這個特定的方案，而非只是宣揚廣義的國語原則，例如言文一致等。從清末官話論述開始，京音既是國音的最有力候選人，但也同時受到各方的挑戰，包括粵音，吳音等保留中原古音(質)、京音不代表全國(量)等說法。直至張士一採取「自然 vs 人造」以及「語言高於文字」等概念，京音的主張才有了更完整的論述。面對京音國語可能打擊其他地區語音的指控，張氏先簡化出兩種統一語言的可能方式：「指定一個現成的言，作為共同語」，以及「創造一種國音」要各地人士遵從。前者其實同時保存了共同語以及各方語言的自然狀態。張氏認為，這「豈不是在兩方面的方言上，都毫無人造的強制執行的痕跡嗎？」。若以第二種辦法推行國語，即是以「全國指不出一個人完全這樣說」的「所謂國音」為標準，那才是「真正的人造強制執行」。推廣京音沒有牽涉到改造語言的內部，相對於創造新語言，或是整合各方既有語言成一新語，都是比較符合「自然」的選擇。⁴⁶

但與此同時，張氏的方案也表露出「自然」概念在政策討論上的限制。張氏本人也意識到，就算是以現成的京音作為國語，也還是要有相應的行動，才能把這標準推行至全國人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樣的行動「總有一些人造的性質」。在為京音辯護時，張氏不難反駁國音方案的對手：對方既然也追求統一的國語，那就一定要有類似的人造行為，如果真的完全排除這些人造成分，任憑自然，「那麼也不必求國語

⁴⁶ 張士一，〈主張京語京音的·其五〉，頁47。

統一和音統一」了。⁴⁷但在現實層面，要如何保持這種相對的「自然」？到底是誰來推動京音？更要者，至少在形式上，「老國音」已在 1910 年由具全國代表組織的「讀音統一會」通過，並由教育部依法公布。要推翻既有的國音國語，改行京音國語，具體方式為何？張氏沒有回答這些細節，只作了大致的理論回應。他主張「人民」主權就是「自然」，應讓他們具有改變現狀的正當性：

又有人說，現在的注音字母，是已經教育部公布的，我們應當尊重法令，照他去教，這句話是打官話，試問法律是誰的法律，共和國家的法律，不是人民所造的麼？人民若是覺得不好，需要改良，那麼就要改良的，祇怕人民不去要求改良，那麼就是政府，無論怎樣都好，也總有不能見到的地方。我想現在的教育部，對於人民方面根據學理的要求，斷不致於就用專制的手段，一筆打銷，或是置之不理。部裡頭恐怕還是有幾個明理的人，一經學者研究指揮出真理，或能從善如流，亦未可知，祇要我們去要求改革就是了。⁴⁸

表面上看來，張氏理想中的政治取徑應由下而上，也就是人民提出訴求，政府予以回應，然後化為政策。但人民的訴求，來自他們對於問題的認識，而這認識需要由「學者」的研究才能「指揮」出來。張氏似乎預設這些學者站在人民的一方。但如果學者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身分，握有國家權力，那他們還是不是真的代表人民？還是人民的意願，始終只能靠類似官的運動者來代言？再者，張氏只強調人民要求改變的方向，但沒有交代政策成形後規範管理與模塑人民語言行為的一面。人民並非一塊整體，操北京話的人民，與習用其他語音的人民，並不一定有共同利益。假設京音是整體成本最低的選項，那也需要第三方的力量，來確保各方

47 張士一，〈主張京語京音的·其五〉，頁 48。

48 張士一，〈國語統一問題〉，朱麟公編，《國語問題討論集》，卷 6，頁 37。

接受得益有多有少的「自然」結果。這力量無論是來自官方或是公共組織，都必然涉及說服乃至強迫的權力。公權力的運用以及與人民之間的利益衝突，遂成為國語運動「自然」論中沒有解決的問題。不過，縱然跳過官方與非官方權力之間的細緻差異，但透過把學者的角色帶入討論，國語運動者畢竟回應了自然論中「沒有主體」的問題。

當 1928 年胡適把《國語文學史》講義改寫為《白話文學史》時，就採取與張士一類似的論述。他塑造出一個可以客觀地認識自然趨勢，且根據認識來調節此趨勢的運動主體：

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⁴⁹

從字面來看，讀者很容易會錯過《白話文學史》與國語運動之間的關係，以為這裡的革命，單純指白話文運動的「文學革命」。但正如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所示，白話文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本來就是一體的兩面。《白話文學史》與胡適前後關於國語推動方針各文章之間，均有密切關聯。《白話文學史》源自《國語文學史》，本來是在國語講習所講授中所產生的講義；〈國語的進化〉刊於《新青年》，但與在講習所的演講〈國語運動的歷史〉同作於 1921 年，內容互相發明。這幾個文本，都鑲嵌在國語運動的脈絡中，可以視為解決同一系列問題的連續過程。

胡適《白話文學史》中革命只是調控自然趨勢的說法，正是針對他

⁴⁹ 胡適，《白話文學史》，頁 6。

1920 年〈國語的進化〉以及 1921 年《國語文學史》的漏洞，進行補強。按先前「國語本諸自然與小民的創造」的論點推論，國語運動者其實只需順從自然趨勢，等待變革到來，並不需要推動國家政策的改變。作為新時代知識菁英的他們，也與歷史上的斯文中人處於類似位置：最多只能整理出一代之文，無法完全順應自然趨勢。因此，國語的自然進化論，其實大可被反對者運用，反過來反對國語運動者們以政策手段干預語文發展。

運動者退場，任由自然趨勢發展，卻絕對不是胡適想看到的結果。在 1921 年〈國語運動的歷史〉的演講中，胡適便勉勵講習所學員做國語運動的先鋒。雖然同年稍後，他又在演講中承認「國語運動」不可能以人工之力完整地統一中國語言，最多只能「統一個大致」；對於方言文學，則應該任它們自由發展。⁵⁰但是，把運動的目標降低，以所謂「打折的統一」（借用王東杰的說法）為目標，並不代表運動者不需要任何行動。到 1923 年，在為《國語月刊》「漢字改革專號」寫的〈卷頭言〉中，胡適還是回到先前的問題，要為少數的國語運動先鋒找尋角色：

在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是頑固黨。〔但〕在這條通則上，又可得一條附則：促進語言文字的革新，須要學者文人們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式的承認。⁵¹

至此，「認清趨勢」成為學者，也即是國語運動者的任務。但「給他們正式承認」的說法，卻無形中把學者設於上位。如果小百姓的革新是本諸自然趨勢，那學者們的「承認」是否還有必要？這「承認」又要以什麼形式進行？胡適當然可以說，這裏的「承認」並不算是違逆自然趨勢；但在讀者來說，還是免不了「干預」的嫌疑。因此，對於國語運動者角

50 胡適，〈國語運動與文學〉，頁 83。

51 胡適，〈卷頭言〉，頁 1。

色的定義，胡適還需要進一步的改寫。

1928 年的《白話文學史》正是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專號」〈卷頭言〉的「認清趨勢」上，再加上「人工的促進」一點，賦予國語運動者行動的正當性。這個看似細微的改動，卻在國語論述內外都有重大的意義。在國語論述內部，胡適在確定運動者角色的同時，加入了「人工的促進」、「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以及「加上了一鞭」等形容，把運動者的行為定義為順應趨勢的「微調」，這種「述而不作」論，至少在修辭上潤滑了自然趨勢與政策干預之間的矛盾。

在國語論述以外，胡適「認清趨勢以調控趨勢」的說法，其實呼應著 20 年代一道重要的思想潮流，那就是以改造社會為目標的「社會科學論述」。王汎森已經指出，在 1920 年代，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主張客觀公理的主義，成為知識人對於人生問題的整合答案。⁵²與此同時，在「客觀公理」中找尋個人主體的位置，就成為各派別的知識人都需要解決的問題。社會科學論述主張能夠以社會科學看透公理，然後據此推動社會的改造，便因此對政治光譜左右兩端的知識人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在左翼的知識人中，瞿秋白(1899-1935)1924 年的〈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便有這樣的說法：「自由不在於想像能離自然律而獨立，卻在於能探悉這些公律。因為只有探悉公律之後，方才能利用這些公律，加以有規劃的行動，而達某種目的。」⁵³

屬於國民黨一方的陶希聖(1899-1988)，也有幾乎完全一致的觀念。陶氏主張「科學地觀察社會」，而且這種科學的觀察，可以讓知識份子成為超越自身階級限制，帶來新局面的革命知識份子。⁵⁴因此，在

52 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頁 266-267。

53 轉引自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頁 265。

54 相關討論，見徐兆安，〈古老的社會幽靈：陶希聖與王亞南的社會科學官

1920年代的社會科學論述中，客觀自然的公理，與個人能動性處於相輔相成的關係。愈強調公理的自然與客觀性，不代表會壓縮個人行動的空間，反而讓看透這個公理的個人，可以根據公理行動，甚至進而調節公理。

胡適 1928 年對於國語運動者角色的解答，暗合了這種社會科學思潮的發展，烙下 1920 年代的烙印。在這個思想背景下，《白話文學史》那些看似強辯而不無誇飾的政治修辭(例如說人力的一鞭有時可以加快自然發展十年，有時卻可以跳到一百年等)對當時讀者，甚至作者胡適本身，都是最新穎又最有力的答案。

正如前面關於張士一的討論所指出，這些國語運動主體論，其實還是跳過了推行政策時官方與私人角色分際的問題。可是，這些官方與私人的矛盾，在國語運動者的經驗與思想中，卻可能不成問題。下節我將結合國語運動者出入於官方與非官方的多重角色，討論胡適與黎錦熙如何理解先覺的運動與政府的關係，並探討這些認識所帶來的政治與思想後果。

四、先覺運動國家：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權力

藉由塑造出「看透小民之間的自然趨勢，並加以調節的運動者」，胡適理順了自然趨勢與政策干預的潛在矛盾。但在推動國語政策的實作中，這少數先覺的「運動者」與政府是處於怎樣的關係？在此，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1934)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國語運動者思路的切入點。在《史綱》正文的開端，黎錦熙對運動的定義與政府的角色有一段著意經營的文字：

僚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4：3(臺北，2022)，頁 425-464。

大凡一種運動，總是起於少數先知先覺者一種有意的宣傳，跟著社會上一般人士受其影響而相與追隨，跟著政府就受其影響而起了反應。……[因此《史綱》]就拿政府對於這種運動反應的事實作一個綱領。真湊巧，剛好每十年成一個段落。⁵⁵

從《史綱》的這段話看來，運動的推動者，是超乎社會大眾與國家之外，藉由他們的先覺，把大眾的意見運動起來，進而影響政府的政策。黎錦熙接著把這個定義，與他對國語運動截止 1930 年代的成果的解釋結合，成為他所謂的「雙潮合一」論。所謂的雙潮，係指國家的國語政策，與以五四運動為核心的社會運動合流，才能在 1920 年代初達到《國音字典》頒訂、學校採用語體文、正名為國語等政策上的具體成果。⁵⁶要在「歐戰結局」，「全世界發生一種新潮流，激盪著中國的社會」下，才引發出社會的潮流，然後「政府和社會互助而合作」，「國語運動才算水到渠成」。這個社會潮流之形體，就是「運動」。⁵⁷這運動卻不是完全「自然」「自發」地在人民之間產生的，必待一群先覺的菁英帶動；而這群菁英也不是屬於官方的勢力，他們只是認識社會、帶領社會、代表社會，讓政府反應。換言之，國語運動者處於超然的位置，既可以客觀地把握社會潮流，又可以不具官方身分地主導官方決策。黎錦熙也似乎預設了，在運動者所觀察的自然趨勢下，國家與社會的目標理應一致。

把黎錦熙《史綱》中的運動論，與胡適《白話文學史》中「認清自然趨勢」與「人工促進」的概念一起共同檢視，我們的確能重構出一種比較圓滿的國語運動理論。但這種重構，卻只代表黎錦熙在 1934 年《史綱》出版前後的觀念，並不是從 1910-1920 年代一直指導著運

55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1，頁 2。

56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3，頁 130。

57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1，頁 2。

動者行動的思想。這看來比較圓滿的定義，卻很可能是受到大眾語運動的挑戰，臨時湊合而成的。《國語運動史綱》本來在 1934 年 5 月即已完稿送交商務印書館，但為了回應國語運動脫離群眾的質疑，黎錦熙趕忙在七月加入一篇長達 117 頁的長序。現時的《史綱》體例因此頗見突兀：在正式敘述何謂國語運動之前，先以極長的篇幅反駁大眾語論述。

除了長序之外，《史綱》正文首頁對運動的定義，很可能也是臨時改動的結果。根據 1932 年刊載在《國語週刊》頭條的〈國語運動的紀念年〉一文，我們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該文有一段明顯是《史綱》定義的藍本：「大凡一種運動，總是起於少數先知先覺者一種有意的宣傳，跟著政府也受其影響而起反應。」⁵⁸這個 1932 年的定義，後面卻沒有 1934 年《史綱》中「跟著社會上一般人士受其影響而相與追隨」一句。這分別甚為關鍵，運動理論會因此呈現完全不同的趨向。在 1934 年《史綱》的定義下，先覺者先號召社會大眾，再影響政府。雖然政府的政策回應還是運動成果的最終標準，但在手段上，先覺者跟政府之間，有著「社會」作為媒介或緩衝。這個論述雖然沒有言明先覺者的非官方身分，但強烈地暗示了他們比較傾向社會大眾的一方。1932 年〈國語運動的紀念年〉中的定義則幾乎完全相反。先覺者是直接運動政府政策的方向，這種運動不但不以大眾響應為前提，更不排除先覺者走進政府，獲得官方名分，直接施行官方權力的選項。相對於 1934 年的定義，1932 年的這一種「運動」容易受到忽略。在討論 20 世紀中國政治文化時，一般多以「集體運動」的框架，來把握種種以「運動」為名的政治行動。這種精英運動國家的路線，通常不會被加入運動的系譜裡面。

⁵⁸ 黎錦熙，〈國語運動的紀念年〉，頁 1。

然而，這種少數人帶動政府的「運動」，卻更能貫串《國語運動史綱》的敘述，即自 1910 年代以來國語運動的種種成果。《史綱》正文的架構，乃按照政府在各階段對於國語運動的政策，畫分為四個時期。在這四個時期中，作為主角的國語運動者們，都運動了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公權力，進而影響政府最終的政策命令。換言之，在《史綱》的敘事中，幾乎只有「先覺的運動者」與「政府的回應」兩端，至於「社會大眾的響應」，則幾乎是缺席的。另一方面，1932 年〈國語運動的紀念年〉一文刊載在《國語週刊》的頭條，可以視為代表運動的宣言性文字，黎錦熙應已琢磨其措辭。因此，與其認為當時黎錦熙對於運動的定義未盡確定，至 1934 年《史綱》方有定見，從而補入「大眾」一句；倒不如這樣推論：沒有「大眾」一句的定義是黎錦熙在 1932 年與 1934 年編寫《史綱》正文時的定見，最後在第一頁加入「大眾」一句，與卷首插入的長序一樣，都是面對大眾語運動的威脅下，臨時湊合的自我辯護。這種修辭上的調整，並沒有改變國語運動論述的核心。

即使撇除這種推論，我們仍然可以肯定，黎錦熙運動論的重點，在於國語運動者可以按照不同時機，策略性地出入官方與非官方之間，選擇與政府分進或合擊。在合的方面，國語運動者不只鼓吹教育部要有所作為，更往往直接運用其官方權力。例如，1916 年洪憲帝制倒台後，身處教育部中的國語運動者，就趁同情國語運動的傅增湘(1872-1949)擔任總長，「想憑藉最高教育機關底權力，在教育上謀幾項重要的改革」。他們「急急地把國語統一籌備會組織成立，作為教育部底一個附屬機關，專辦行政方面關於國語的事。」⁵⁹ 1925 年重申國文為國語一案的例子，則更為驚人。當時即將上任的教育總長章士釗(1881-1973)，素來反對白話文。在教育部內的國語運動者，包括黎錦熙(當時以統一籌

⁵⁹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2，頁 66。

備會委員的名義在部內行走)，遂搶在章氏正式到任前，發出一紙公文，重申 1920 年改國文為國語的法令，防堵章氏上任後推翻前案。⁶⁰由此觀之，國語運動者之於教育部，猶如部內之部，可以以權限不明的委員身分，運用該部作為國家部門的官方權力。

在分的方面，當教育部由反對者所主導時，國語運動者就會以「民間社會」的名義活動。1916 年成立的「國語研究會」，就定位為民間組織。但這所謂的民間，其實是同一群運動者的結合，只是換一個名義而已。《史綱》亦毫不諱言，這個「民間」研究會的成員，與後來「官方的」統一籌備會高度重疊，都是以蔡元培為核心的北大教授群。⁶¹之所以要維持一個名義上的民間組織，與籌委會平行，是怕當時政府對國語運動有所反彈，要有一個「應該屬於民間的團體，而不可與行政機關稍有關聯」；「而行政方面，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事件，便完全由國語統一籌備會去主持」。

綜觀《史綱》，黎錦熙所敘述的國語運動，基本上就是一個先覺的運動者出入於政府內外，與政權周旋的故事。就算有所謂的「社會」，也是像研究會那樣，由運動者分飾出來，只在名義上稱為民間組織。這所謂社會組織的存在，只是一時權宜之計或機緣成立，一旦運動者掌握穩固的官方力量，就不必長期維持。據黎錦熙在《史綱》所述，當改國文為國語案在 1920 年正式敲定，國語運動獲得官方政策背書後，研究會便「功成身退」。「國語運動這件事大可不必再和行政機關分家，一切會務便由統一會兼辦了」，「況且這籌備會的成員，大

60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3，頁 136。黎錦熙所提及的公文，是〈教育部訓令第四十一號〉。〈訓令第四十一號〉在 1925 年 2 月 23 日發布，的確早於章士釗 4 月 15 日就職，但並不是他所謂的「前幾天」。〈訓令第四十一號〉載於《教育公報》12：2（北京，1925.3），頁 10-12。

61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2，頁 71。

多數就是研究會的成員」，後來索性「宮中府中，俱為一體」。⁶²

策略性地、權謀地運動國家的路線，也不是黎錦熙的個人發明。與前述的自然論一樣，黎錦熙對國語運動與政府關係的論述，同樣受到了胡適的影響。早在 1921 年的〈國語運動的歷史〉，胡適便提出運動者與政府直接合作的主張：

從民國八年教育部辦一個國語統一籌備會，到現在不過一年半，能推行到這步田地，實在是私人和團體組織種種機關——像這個國語講習所等——來竭力推行的力量，不是政府的力量，很可喜。然而我是主張有政府的。政府是一種工具。就把國語來講，政府一紙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幾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來做。照現在的情形講來，大家要幫政府，又要政府來幫我們。換句話說，一方面政府是很有力的工具，一方面，還要私人和團體來提倡扶助。⁶³

胡適略過國語講習所與統一籌備會的關係，把它們分為政府與私人兩種機關，沒有像黎錦熙那樣高調地說「宮中府中隨時可以一體」。但與黎錦熙 1932 年定義吻合的是，這個私人，是沒有「社會大眾的響應」在裡面的，其主體是「我們」；而正如上述引文末段所示，所謂的「我們」與「大家」就是胡適這些講習所的導師，以及作為「國語的傳道者」、「國語的先鋒隊」的講習所學員。因此，胡適也認同國語運動就是少數先鋒與政府互相幫助的成果。

少數先覺運動國家權力的路線，正是胡適推動國語的指導原則。這原則的實踐，最能展現在胡適對於公文白話化的長期遊說上。對五四後的胡適來說，公文是白話與國語運動未能征服的領域。1920 年改

⁶²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卷 2，頁 74-75。

⁶³ 胡適，〈國語運動的歷史〉，頁 8。

國文為國語的政令，雖然奠定了白話國語在教育領域的正統地位，但在官方，以及更廣大的公共領域裡面，正式文書始終沒有白話化。公文的套語，既有傳統構成的儀式性權威，不以文言寫作就無法表達其鄭重；在功能上，它也有無法取代之處，例如透過套語才能表達文書傳遞引述的種種層次與輕重等。1920-30 年代，白話化的推動者提出用新式標點符號取代套語，希望以此為基礎，使公文白話化。但他們提出的方案，以及實作的成果，並沒有展現出取代舊公文的可能性，不足以說服廣大的公文使用或閱讀者。⁶⁴因此，公文若要白話化，所依賴的必將是從官方權力而來的強制手段。

胡適推動公文白話化的遊說，最晚始於 1922 年，時值國文剛改為國語，王寵惠(1881-1958)好人內閣成立。胡適採公開呼籲與私人遊說的方式雙管齊下，遊說好人內閣的教育部長湯爾和(1878-1940)推動公文改革，採用國語白話文。⁶⁵但好人內閣在同年十一月倒台，公文白話化失去政府內的支援，胡適「談政治」的活動同時轉趨收斂。直至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胡適才再一次以政權為對象，倡議公文白話化。

胡適對國民政府的遊說，及其背後的政治概念，都呈現於 1929 年的〈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國民黨〉一文。這篇名文，一直被視為胡適以知識份子批判黨國政權的代表作。其中最受注意的論點，是直斥國民黨箝制言論自由，以及推行文化復古的政策，試圖逆轉新文化運動的成果。該文對於國民黨(尤其是宣傳部長葉楚傖(1887-1946)的批評猛烈，

⁶⁴ 1930 年代公文改革與白話化的分合關係，我將另文處理。關於同時期公文改革論述的初步探討，可參考沈蕾，《民國時期公文程式研究》(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李章程，《民國時期的公文改革與行政效率(1912-1949)》(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⁶⁵ 胡適，〈這一週〉，《努力週報》21(北京，1922.9)，頁 1。

甚至直斥對方為文化革命的反動份子。⁶⁶但若把這篇名文置於國語運動的脈絡中重新審視，我們則會看到另一層面的訊息。

在白話文國語的推動上，胡適其實充分認識到國民政府可以提供的助力，以及雙方存在著合作的空間。首先，文中胡適多處對國民黨表達溝通的意願。不僅聲明前此自己在《新月》的文章曾認真討論孫中山主義，更在本文藉著引述戴季陶(1891-1949)的話，曲折地表明在「文字革命」上，國民黨與新文化運動者可以、也應該處於同一陣線。至於在公文白話化的具體提案上，胡適激將與勸導兼施。他引用 1920 年改國文為國語的成功例子，指出「徐世昌(1855-1939)做總統，傅嶽芬(1878-1951)做教育總長的時代」，都可以推行國語運動，比這些軍閥政權更進步的國民黨，自然應該與國語運動者合作。文章最後更明白地表示，對於公共領域書寫的白話化，國民政府的合作是必需的：

報紙和法令公文仍舊用古文，國語的推行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因為學了國語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做訪員，不配做小書記，誰還肯熱心去學白話呢？一個革命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嶽芬的膽氣都沒有嗎？⁶⁷

⁶⁶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時論集》，卷 3，頁 356。

⁶⁷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頁 365。值得注意的是，被胡適點名為國民黨復古反動勢力的宣傳部長葉楚傖，在前一年(1928)已經推動公文革命。胡適，〈文書革命之新演說等因奉此一概刪除〉，《新聞報》，1928 年 3 月 6 日，第 8 版。其提案雖然沒有完整地提出白話化，但其訴求卻與胡適的大致相通。在 1928 年紀念週上，葉氏發表關於公文革命的演說，指出既有公文的文言套語，例如等因奉此之類，其實只有標點符號般的功能，只要使用新式標點，就可以去除這些陳套。更要者，在政治倫理的層面上，國民政府作為一個革命政府，實在不應該使用與封建王朝，以及軍閥政權同樣的公文套語，這些套語，例如叩，伏等用語，源自舊社會的上下差等，不合乎民國的社會秩序。由此觀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文章中展現雙方的對抗性，可能只是為了增加立論的力度，刻意經營的宣傳技巧。

胡適文章最堪玩味的，是最後提出的五點要求。他一方面呼籲國民政府以官方的力量，確立國語白話文在公共領域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則要求當局停止干預言論自由。頭兩項要求分別是：(一)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二)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第三項則筆鋒一轉，要求國民黨尊重言論自由，不要以意識形態干預教育，廢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制度、機關。第四項要求國民黨「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第五項則要求國民黨不要連「專制帝王」也不如，要「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這三點不但與公文白話化的提案無涉，而一面要求官方力量協助推動白話化國語，一面批判國民政府的思想工程，兩者雖然不絕對衝突，但就文脈來說，一篇文章同時尋求合作與直斥其非，不無突兀之處。

但這個突兀之處，卻正好提供一個切入點，讓我們更確切地把握胡適以至國語運動者對運動國家權力的概念。當時為國民黨辯護的寫手，就把胡適的這兩種態度，演繹為政府干涉與放任自然的矛盾，藉此批評胡適政治思想的不一致：⁶⁸

⁶⁸ 光虞，〈讀「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後答胡適〉，《民國日報》，1930年2月8日，第12版；1930年2月9日，第12版；1930年2月11日，第12版；1930年2月12日，第14版；1930年2月14日，第14版。作者光虞的真實身分不明，但這篇文章大量引述楊銓〈答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可以視為立場類近之作。楊銓原文則收錄於陳保平主編，《新民春秋：新民報·新民晚報八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正如江勇振近年的研究指出，楊銓與胡適同是留美學生，也是舊識，但在20年代中期以後，二人對於教育獨立的理念不合，最終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改選等具體問題上交鋒。楊氏代表更激進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視儼然為美國代表的胡適為敵人。但這並不影響胡適與國民黨之間的潛在合作關係。江氏指出，國民黨上層蔣介石、宋子文等權力核心人物，都與胡適維持溝通的渠道。攻擊胡適的國民黨人，既然不是這些「閥王」，而是楊銓那樣的「小鬼」，實則上對胡適造成的滋擾有限。江勇振，《舍我其誰：

(一)(二)兩項是關於文學革命一方面的，(三)(四)兩項是屬於言論思想自由一方面的。前者是胡適先生不滿意於政府的「放任」態度，而主張「干涉」，後者又是胡適先生不滿意於政府的「干涉」主義，「而主張放任」。我不知道胡先生到是「放任主義」者，還是「干涉主義」者？假如是「放任主義」者，那就不當說出(一)(二)兩項的鬼話；假如是「干涉主義」者那又不應當發出(三)(四)兩項的謬論，然而胡適先生畢竟兩全其美的提出來了。⁶⁹(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兩全其美」是強力的諷刺，但對胡適來說，這諷刺卻很可能是不成立的。若從前述胡適《白話文學史》所展現的自然趨勢與人為調節觀念來看，採取放任與干涉，是先覺者可以根據對自然的認識自我判斷的。白話化是社會的、小民的、自然的趨勢，所以國家順應這種趨勢，並不是強制的統一行為。這與國民黨以黨的意識形態強推思想統一，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政治的行動上，先覺的運動者本來就可直接運動政府的力量，他們既自認處於驅動、甚至役使政權的位置，同時遊說勸導與批評，也並無不合理之處。換言之，從國語運動的進程來看，胡適此時對政府的抨擊以及他鼓吹政府干預社會的政策，的確是可以兩全其美的。國語運動所摸索出來的文化權力，也正好以這樣的兩全其美為目標。

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 1927-1932》(臺北：聯經，2018)，頁 151-152。

⁶⁹ 光虞，〈讀「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後答胡適〉，1930年2月11日，第12版。

五、結論：國語如何「運動」？⁷⁰

現在有關國語運動的研究，無論著重現代中國的「聲音轉向」，或承載聲音的物質條件，絕大多數都從「國語」的內容著眼。國語運動如何作為一種「運動」，卻少有受到深究。

本文指出，至少從 1910 年代晚期開始，國語運動推進的道路，就是由少數先覺者運動國家，再由國家頒布政令造成改變。1920 年國文科改為國語科，是國語運動制度上的最大勝利。這勝利的經驗，加上教育部前後各個國語委員會作為運動的制度機關，先覺者運動國家的路線更趨穩固。然而，這條貫通知識人與政府的改革捷徑，卻留下頗為糾結的理論問題。首先，在民國政體下，先覺的運動者及其所運動出來的國家政策，到底是根據什麼正當性來行動？其次，胡適等提出「自然趨勢」一說，以為國語運動及其政策正當化；但此說卻無可避免地帶來一個悖論：如果國語運動真的是自然形成的趨勢，運動者為何還需要運動改革，他們在這「趨勢」中到底可以扮演什麼角色？換言之，「自然趨勢」同時可以成為尊重現狀、反對人為干預的依據。

直到 1928 年的《白話文學史》，胡適才較為完整地回應這些問題。胡適為運動者提供了一個新的主體，就是察知自然趨勢，然後加以適當引導與調節的先覺者。這就是所謂「革命只是自然趨勢加上人力的一鞭」的說法。在現今的讀者看來，這說法甚有曖昧與任意之處。《白話文學史》指出，人力調節造成的效果，可以把自然趨勢的速度加快十年到百年，成效增加十倍到百倍。就算同意自然

⁷⁰ 小標題借用自陳建守，《啟蒙如何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念史》（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2016）。

趨勢的說法，這樣大幅度的變動，真的還在自然趨勢本來的軌跡上嗎？更何況自然趨勢的方向，本來就是預設多於論證的結果。因此，從後見之明看來，趨勢與調節的論述還是不盡完善的。可是，正如本文第三節所提及的，胡適的這種論述在 1920 年代的語境中，卻是一個重大突破。就國語運動內部而言，《白話文學史》比較完整地處理了自從 1920 年獲得勝果後所累積下來的理論問題。換言之，結合胡適與黎錦熙等國語運動者前此的論說，才能了解他們經歷過的理論困難，理解《白話文學史》帶來的進展。就更廣大的思潮來說，1920 年代不同光譜的知識人，都有從自然的、客觀的公理或定律中，找尋行動主體的共同關懷。從瞿秋白與陶希聖的例子可知，當時能對客觀定律中的主體位置提出答案的，都會獲得熱烈的回應。

根據自然趨勢與人力調節的概念，由先覺者運動國家政策的國語「運動」理論，至此大致定型。在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國語運動面對兩方面的變局與挑戰，但這套運動的理論並沒有改弦易轍。變局首先來自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一般認為，國民政府一反民初以來政權對知識人團體相對放任的政策，積極整頓教育與文化界，改變了文化領域的地貌。但從近年的研究看來，胡適等知識人與國民政府的對話空間，其實比想像中大；關於知識人團體的個案研究，也提供了不少在政權轉換下延續的例子。⁷¹更要者，無論是國語運動的一貫方針，乃至胡適 1920 年代末發展出的運動理論，都提供了與國民政府合作的空間。由此切入，本文對胡適 1929 年的名篇〈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國民黨〉重新解讀，指出胡適在批判國

71 例如教育心理學的群體，就從心理學會改組為測驗學會，但在人脈上大致延續。見 Shiuon Chu, "Ambiguous Objectivity: The Standardized Test Movement (1920-1937) and the Remaking of Chinese Examination Discours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4:3 (October 2019): 355-359.

民黨的同時，又釋出合作意願的多層次訊息。在制度上，國語運動最終也在國民政府執政下「順利過渡」，包括 1928 年的國語統一籌備會，以及 1935 年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在人事與形式上，基本上都只有局部改組，而沒有推翻該運動自 1910 年代末期以來的格局。

另一方面的挑戰，則來自 1930 年代初的大眾語運動。本文第四節已指出，在大眾語運動的壓力下，黎錦熙臨時修改了先前(1932)有關運動的定義，把「大眾」加在運動者與政府之間。但這改動卻沒有改變國語運動的根本方針：反映在《史綱》的，仍然是國語運動者運動國家政策的各項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1934 年加入「大眾」的新定義，就算不完全是虛應故事，但也是權宜之計，至少難以像 1932 年的定義那樣，統合了理論與實際成績。再者，國語運動既然在國民政府治下「順利過渡」，先覺運動國家的路線，也就沒有作重大修正的必要。

成形於 1920-1930 年的「先覺運動政府」模式，與現今新文化或五四運動的各種理解，都不盡吻合，它展現出知識人政治與文化生活中鮮少受到注意的面向。首先，國語運動與所謂啟蒙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有顯著的分別。羅家倫(1897-1969)是把新文化運動比附為啟蒙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一人。經過多年的思考，身為當年五四學生運動領袖的羅家倫，傾向把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定義為一種由思想家與文人以其作品所構成的運動。⁷²強調知識人創造與領導的位置，羅家倫 1943 年《新人生觀》〈知識的責任〉一章，就特別指出「知識份子得天獨厚，受了人間的特惠」。⁷³羅家倫所重視的思想文學創造者，與胡適的「自然趨勢調節者」，雖然都可以被歸類

72 羅家倫，〈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1931)，《羅家倫先生文存》(新店：國史館，1976)，卷 5，頁 190。

73 羅家倫，《新人生觀》(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頁 15。

為菁英主義，但兩者的思想內涵，卻有細緻而關鍵的分別。胡適運動論的主調，還是客觀的自然趨勢，縱使我們接受批評者的指控，認為他的國語遠離大眾，但他的國語運動者，在理論上還是受到自然趨勢的制約，而在理論上，這自然趨勢之中，有著無數的小民在裡面。羅家倫的菁英卻與此相反，是趨勢與潮流的創造者。更要者，羅家倫的運動論，也一直繞過實務與政治運作的層次，這跟國語運動有具體的制度機關，運動者具體討論運動的實務路線，有著顯著分別。

其次，如果把新文化運動視為一種啟蒙大眾的運動，猶如李孝悌所指出，自清末以來所累積的下層啟蒙路線的話，國語運動也不屬於這種定義下的運動。⁷⁴國語運動的著力點，是上層頒布的政策與標準，自動發生轉轍器般的作用；就算是有講習所的成立，也是先培養國語「先鋒隊」，沒有立刻走進大眾的計畫。從這兩方面來看，國語運動與作為啟蒙的新文化運動，都屬於不同的源流。

在運動的方法上，國語運動也有別於五四或新文化運動。近年來，研究者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具體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其中，「輿論戰」與「商戰加組織動員」兩種模式的發現，指出少數運動者可以發放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尤其能修正公共意見在閱讀的公眾間，透過自然競爭與淘汰而來的預設。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輿論操作，王奇生就以動詞的「運動」，來理解運動者可以透過類似「假戰爭」的論戰，模塑甚至製作大眾的反應。⁷⁵但國語運動的論述，卻偏離這種「對外宣傳」、製造輿論的「運動」。國語運動者固然不能完

7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7-14。

75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1-38。

全漠視輿論，但至少在本文所討論的文本中，他們的運動對象，一是圈內的運動者，對他們討論運動的路線；再來就是對政府「公開喊話」，而不是把社會大眾作為「公正第三人」的輿論戰。

另一種運動的方式，則來自清末以來凝聚而成的東南集團。陳以愛近著《運動的力量》中提出，自清末以來，以商界為中心，貫通教育會、教會、學校的東南集團網絡，持續地進行反日民族主義動員，五四運動其實是這個持續過程的其中一環。⁷⁶陳氏的發現同樣告訴我們，少數人可以透過各種組織與制度的方式，達到不成比例的放大影響。可是，國語運動的組織，明顯比東南集團網絡內的商會，教育會，學生會的規模要小。雖然在 1910 年代晚期，國語研究會的會員人數已經逾千，但 1920 年改國文為國語的成果，以及隨後的種種運動，都是由教育部內委員會的少數運動者推進。就算是講習所的學員，胡適也把他們定義為少數先鋒，而不是被動員的大眾。

「一小撮人怎能獲得足以影響許多地方和大眾生活的力量呢？」⁷⁷廣義來說，國語運動與上述幾種意義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運動，造成大規模的影響。撇開羅家倫後期筆下

76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頁 577-583。陳以愛雖在結論（頁 579）中提及「國語運動」也是東南集團裏面青年會系統所鼓動的眾多「運動」之一，但全書沒有關於國語運動的正式討論。若要追溯國語運動與東南集團的交涉，張謇主導下的江蘇教育會的確是國語運動的重要推動力。1911 革命前夕全國教育會通過國語統一議案，就以江蘇教育會為主力。1913 年讀音統一會的產生，正是接續全國教育會的議案而來。可是，最晚到 1916 年國語研究會成立前後，國語運動的新主力已轉變成圍繞蔡元培且身處北京的知識人，包括本文所述的胡適與黎錦熙，以教育部為中心推動國語改革。這兩波國語運動的延續與轉變，我將另文討論。

77 Bruno Latour，〈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頁 251。

那由思想家與文豪組成的藝文運動不論，國語運動「先覺運動國家」的路線，比諸輿論戰與組織動員，其槓桿的力點更小，效應沒有降低，甚至更大。這種權力的槓桿操作，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政治生活中，是無法忽視的。

(本文於 2021 年 12 月 8 日收稿；2024 年 6 月 3 日通過刊登)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史料

- 〈訓令第四十一號〉，《教育公報》12：2 (北京，1925.3)，頁 10-12。
- 王照，《官話和聲字母》，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 朱麟公編，《國語問題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影印上海中國書局 1921 年版。
- 胡適，〈卷頭言〉，《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1：7 (上海，1923)，頁 1-4。
- 胡適，〈國語的進化〉，《新青年》7：3 (上海，1920.2)，頁 10-22。
- 胡適，〈這一週〉，《努力週報》21 (北京，1922.9)，頁 1。
-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新月書店，1928。
- 胡適，《胡適時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 胡適講，嚴既登、華超紀錄，〈國語運動的歷史〉，《教育雜誌》13：11 (上海，1921.11)，頁 8-9。
-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2：6/7 (上海，1929.9)，頁 11-25。
- 陳保平主編，《新民春秋：新民報·新民晚報八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
- 勞乃宣，《簡字譜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 勞乃宣撰，桐鄉盧氏校刻，《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臺北縣：文海，1969。
-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疑古玄同，〈公文與白話(3)鞋子話〉，《國語週刊》(北京)24 (北京，1925.11)，頁 7-8。
-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國語文學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
- 黎錦熙，〈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國語文學史》代序)〉，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國語文學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頁 1-15。
- 黎錦熙，〈國語運動的紀念年〉，《國語週刊》(北平)2：31 (北平，1932.4)，頁 1。
-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羅家倫，《新人生觀》，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
- 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新店：國史館，1976。
- 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二)報紙

《民國日報》(上海)

《晨報副刊》(北京)

《新聞報》(上海)

二、近人論著

Bruno Latour 著，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臺北：群學，2004，頁 219-263。

王中江，《自然和人：近代中國兩個觀念的譜系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王東杰，〈聲入心通：清末切音字運動和「國語統一」思潮的糾結〉，《近代史研究》2010：5(北京，2010)，頁 82-106。

王東杰，《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 1927-1932》，臺北：聯經，2018。

吳曉峰，《國語運動與文學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李章程，《民國時期的公文改革與行政效率(1912-1949)》，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沈蕾，《民國時期公文体式研究》，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

席雲舒，〈五四前後胡適論文學革命的三篇英文論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10(北京，2020)，頁 196-210。

徐兆安，〈古老的社會幽靈：陶希聖與王亞南的社會科學官僚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4：3(臺北，2022)，頁 425-464。

崔明海，《近代國語運動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 陳以愛，〈王國維與胡適文學革命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臺北，2018)，頁 63-115。
-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 陳建守，〈作為集合事件的「五四運動」：五四的概念化與歷史書寫〉，黃克武主編，《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9，頁 412-444。
- 陳建守，《啟蒙如何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念史》，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2016。
- 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臺北：商務印書館，2021。
- 劉季倫，《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
- 潘光哲，〈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思想史》6(臺北：2016)，頁 1-45。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Bourdieu, Pierre.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Edited by Patrick Champagne, Remi Lenoir, Franck Poupeau, and Marie-Christine Rivière.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 Chu, Shiuon. "Ambiguous Objectivity: The Standardized Test Movement (1920-1937) and the Remaking of Chinese Examination Discours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4:3 (October 2019): 355-359.
- Kaske, Elizabeth.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 Liu, Ji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iscourse of Fangyan in Moder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1:3 (October 2016): 217-233.
- Murata, Yujiro. "The late Qing 'national language' issue and monolingual systems: Focusing on political diplomac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9:3 (2016): 108-125.
- Tam, Gina Anne. *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Weng, Jeffrey. "What Is Mandarin? The Social Project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3 (August 2018): 611-633.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the Genesis of Cultural Power in Modern China: Hu Shih and Li Jinxi's Exchang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Shiuon Ch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national language” emerged as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eld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modern China. Advocates for the national language not only reshape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through reforms of language but also defin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with their ideas of reform. How did agent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mostly intellectuals active in the modern Chinese academy—understand and harness the enormous power involved in their project for reform? Focusing on the writings of Hu Shih and Li Jinxi, 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ourse of power with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oth Hu and Li are well-known as leaders within the movement, yet their interactions remain under-explored in the vast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This paper uncovers unnotice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ir writ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ir unique concept of “movement,” which distinguished it from other cultural movements of the time.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of Hu and Li, I argue, was neither a movement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nor a mass, student-led movement. Instead, they saw their movement as a series of strategic actions that enabled them to employ the power of the state for their goals of change.

This alternative definition of movement underscores a new form of agency, often overlooked in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Culture Movement, Hu Shih, Li Jinxi